

# 江苏徐州铜山区“桓魋石室”调查简报

闫天一 刘超 梁勇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徐州博物馆

(徐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

**摘要:**“桓魋石室”位于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茅村镇洞山村桓山西麓，京杭运河北岸。该墓属于西汉大型墓葬，为西汉楚王级别专用的大型横穴岩洞墓。墓葬早年被盗，长期开敞，墓葬结构遭受后代扰动严重，随葬品不存。此次调查发现的遗迹有摩崖石刻 46 方、亭台建筑基址 1 处，遗物有石碑 5 通、石望柱 7 截、石栏板残块若干、佛像 1 尊，为徐州地区西汉楚王墓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古材料。

**关键词:** 徐州；“桓魋石室”；西汉；横穴岩洞墓；

“桓魋石室”史籍记载为“泗上胜景”之一、春秋时期宋国司马桓魋之墓<sup>[1]</sup>。20 世纪 80 年代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sup>[2]</sup>。该墓位于桓戒山西坡半腰<sup>[3]</sup>，距徐州城市零公里标志 8.6 千米。桓戒山现为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茅村镇洞山村境内石灰岩小山，南北长 220 多米，东西宽近 200 米，海拔 46 米，坐标位置在北纬 34° 20′ 2.05″~2.50″、东经 117° 13′ 25.10″~28.52″。其向东约 700 米至京沪铁路，往南 170 余米抵京杭大运河<sup>[4]</sup>，朝西略偏北 160 余米紧邻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在被称为“南山”的山头阳坡，其山北侧、西北侧方位毗邻后楼山、小土山两座山头），青山隔运河在西南约 600 米处与之相对，东北方（小）庙山、大山距其 900~1120 米。此组矮缓岗丘山头，是徐州城北部天然屏障——九里山余脉在其东北端蔓延出露。



图一// “桓魋石室”位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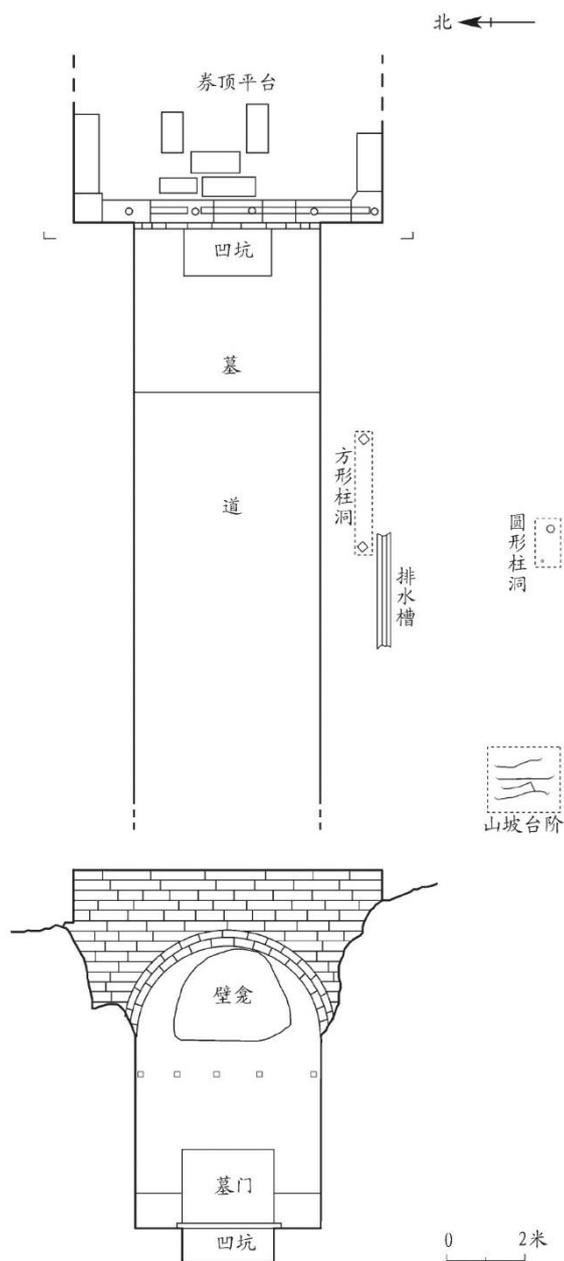
---

宋金以来“桓魋石室”敞露郊外，墓内文物早已不存。既往工作中，仅开展过两次有关“桓魋石室”的考古调查。1986年，江苏徐州博物馆会同南京大学发掘北洞山楚王墓时，曾对此做过简单调查，有关学者也提出了对该墓的看法<sup>[5]</sup>，但未进行深入的考古调查测绘。2001年11—12月，徐州博物馆与北洞山汉墓博物馆联合对该墓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sup>[6]</sup>，但未有系统调查与研究报告发表。

该墓虽然已经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但保护现状堪忧。为避免资料流失，推动徐州汉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工作的开展，2018年徐州博物馆等单位在2001年调查基础上，再次对“桓魋石室”及其周边展开田野调查工作。现将调查收获初步报告如下。

## 一、墓葬概况

该墓为“凿山为藏”的横穴式岩洞墓，其坐东向西，方向270°。现存总长32.35米。由墓道、甬道前段、南北前侧室、甬道后段、南北后侧室和后室组成（图二、图三）。



图二//“桓魋石室”墓外现状平面、正视图

### (一) 墓道

墓道在半山坡上露天开凿，水平投影呈长方形，长 18.8、宽 4.65 米，外口前端被现代建筑（洞山小学校）叠压。分前后两段，之间有 0.88 米的上下高差。前段为斜坡墓道，西高东低，坡度  $13^\circ$ ，残长 11.3 米；后段为平底墓道，底面近长方形，长 7.5 米，后壁高度超过 8.91 米。南北东三壁顺山丘自然岩体走势削凿，东后壁较为完整，南北两侧壁西半部上端受风化侵蚀脱落严重，残存壁面与底面基本垂直；前后段墓道结合处距底面 0.88 米高处凿有一阴刻基线环绕各侧壁面，西起于前后段墓道结合点，往东延续至前甬道侧壁。

---

距后段墓道底面 3.98 米高处，有 7 个方形孔洞，东壁 5 个（图二），一字排开，北、南壁各 1 个（图三、图五），大小略有差异，边长 13.5~14、进深 8~9 厘米。

后段墓道东部底面居中向下开凿一长方形凹坑，上口东西长 4.4、南北宽 2.23 米，东侧与墓门外壁平面齐；底面在距坑西壁 1.73 米处形成西高东低的两级台面，且距上口分别为 0.36、0.86 米。

墓道三壁都有摩崖石刻分布，数量不等；东壁上方凿有一龛，其底端距墓门上沿 2.6 米，龛顶部呈穹隆状，宽 2.5、高 2.7、进深 1 米。龛后壁有 1 方石刻，字迹漫漶不可辨。

平底墓道上方有条石砌成的券顶（图二；彩插一：1），内高 2.33、内宽 4.65、进深 3 米，从距后段墓道底面 4.85 米高处起券。券体由纵向 27 列条石并排构筑，外沿以 2 层条石盘筑封口。其中下层厚 0.3 米，向内敛收 0.25 米；上层厚 0.15 米，周圈向东退收 0.15 米后水平镶垒石料起墙，券顶高点上方叠有 6 层，筑成一个平台。平台向东延伸与山坡相接，西首封边条石共 7 块，南北一字排列，通长 7.73 米，其上不均匀分布有 5 个圆形柱洞，直径 17~17.5、深 12.5~13 厘米，且柱洞间有条状浅凹槽。南、北首封边条石保存情况较差，均仅存一块，残长分别为 2.2、2.85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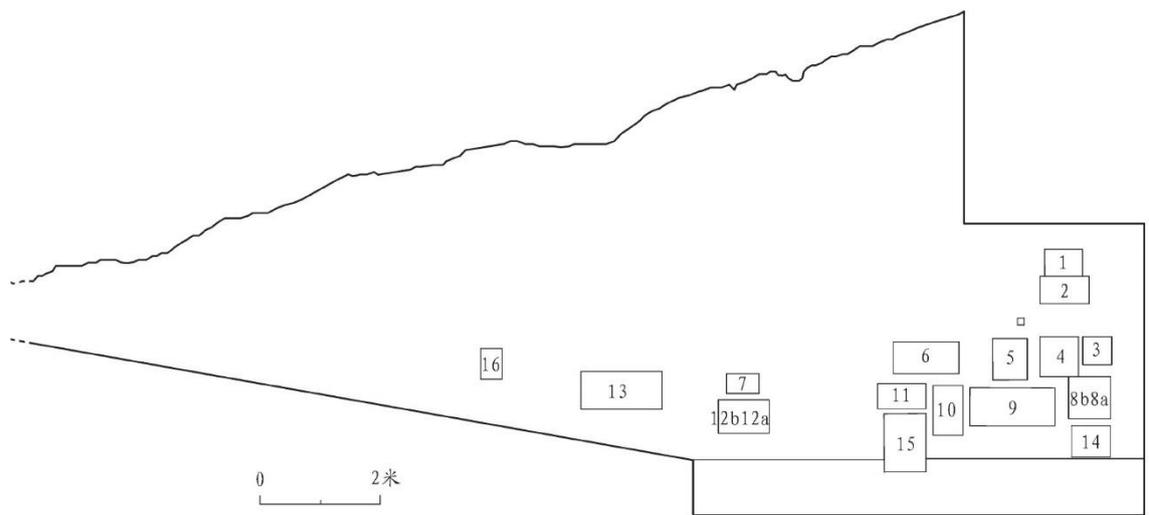
## （二）排水槽

距墓道南壁垂面约 0.72 米凿有一道平行于墓道的凹槽，被毁严重，残存部分长 3 米，横截面呈倒梯形，上底宽 27~33、下底宽 22~25、深 14~28 厘米，应为排水槽，具有阻、排水作用。其南北两侧各有二柱洞，槽南 5.4 米、墓道南壁上口外侧 5.9 米处有一圆形柱洞，直径 22、深度 12 厘米，向东距券顶外切面 8 米。该柱洞西北 0.7 米处有一小圆形柱洞，直径 6、深 4 厘米。排水槽北侧有两个东西纵列方形柱洞，距券顶西口分别为 5.6、8.4 米，东洞边长 16、深 18 厘米，西洞边长 14、深 12 厘米，顶角均与排水槽长面相对。

## （三）墓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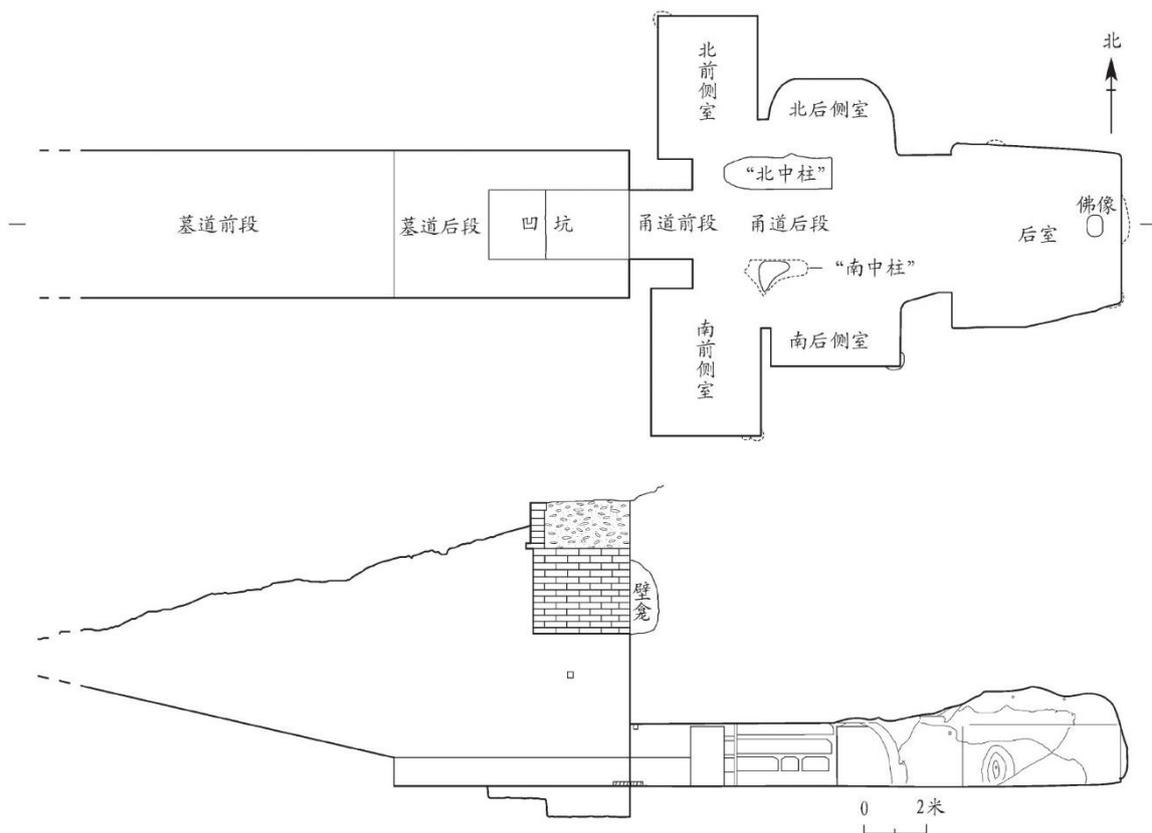
墓门高 2、宽 2.2 米。南北两壁距墓门开口 13 厘米处各凿有一方孔（图七：1、2），与门道顶齐平，高 18.5~19、宽 12~13、进深 10~13 厘米。

底面铺设两层与墓门等长的长方形石板，宽 40~51.5、上层厚 16.5、下层厚 20 厘米，门外顺接一块略长于墓门宽度的石板，宽 50、厚 16.5 厘米，搭在墓道方形凹坑上口东沿。墓门底面未见门枢窝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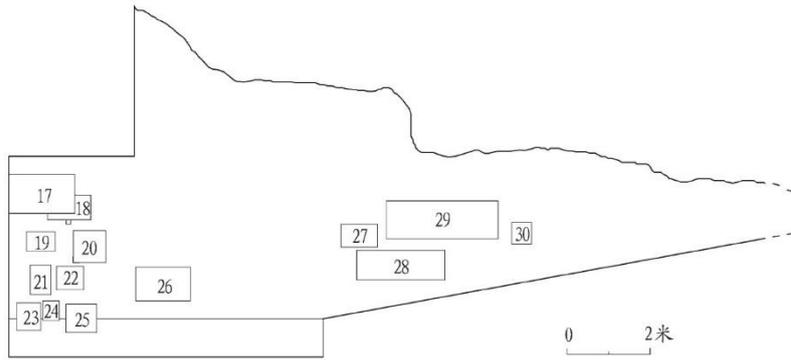


图四//墓道北壁摩崖石刻分布图

10. “宋元符二年”题刻 15. “宋政和五年”题刻（1—4、6—9、11—14、16 均明代开凿，5 清代开凿，均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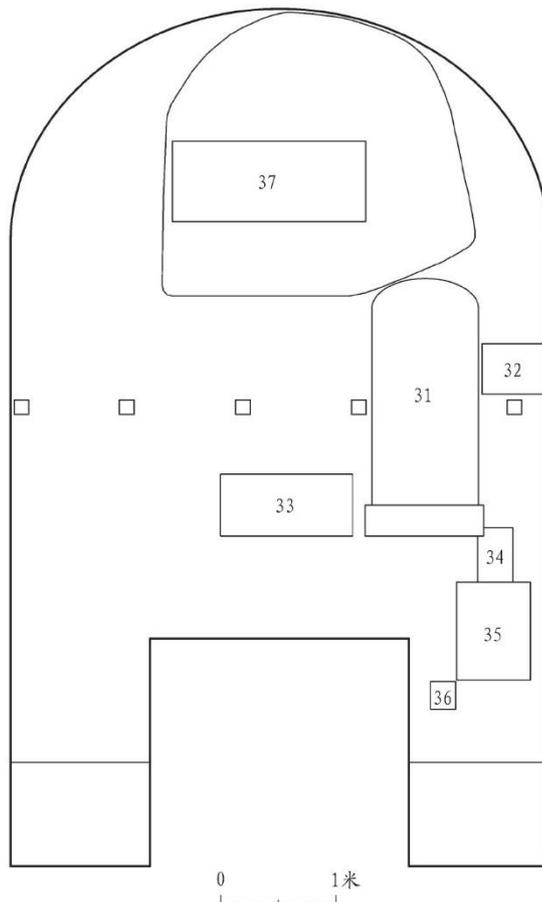


图三“桓魋石室”现状平、剖面图



图五//墓道南壁摩崖石刻分布图

27. “石洞何年此凿成”题刻（17、19—24、29 均明代开凿，28、30 清代开凿，18、25 被磨除，26 原镶嵌刻题石板遗失，均略）



图六//墓道东壁摩崖石刻分布图

34. “宋宣和三年”题刻 36. “金大安元年”题刻（31、32、35 均明代开，33 原镶嵌刻题石板遗失，37 钟乳石化不可辨，均

略)

#### (四) 甬道前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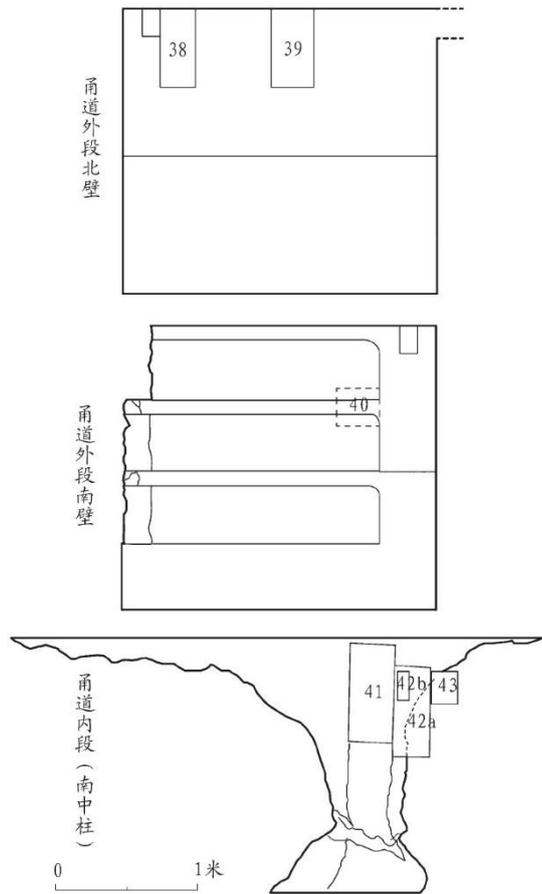
为了叙述方便,以北前侧室门道东壁为界,将甬道分成前、后两段。甬道前段东西长 2.1、南北宽 2.2、高 2 米,面积 4.62 平方米。平顶,其上有一条裂隙,始于墓口近南端,止于北前侧室门道东壁,与南北壁面基本垂直,南北两侧各开凿一侧室。

甬道前段北壁较为平整,仅外端贯有纵向窄细裂隙,紧贴墓门北壁方孔东边并列两方摩崖石刻;南壁由墓门外口往东 0.4 米处凿有 3 层壁龛,顺甬道壁延伸至南前侧室门道西壁,平面呈曲尺形,分上、中、下三层,隔梁厚 0.1 米,龛进深 0.2 米左右。上层高 0.43 米,距甬道顶 0.1 米;中层高 0.41 米;下层高 0.35 米,距地面 0.51 米。此外,其西半部被今人用水泥镶栏板石补平。南壁亦有一方摩崖石刻,但被后期开凿的上、中两层壁龛打破。

#### (五) 前侧室

对称分布于前甬道南北两侧,室内平面均为长方形,平顶,转角处呈弧形,有门道与甬道相通。北前侧室门道偏于墓室南壁东侧,宽 1.05、高 1.8、进深 1.05 米。室内南北长 4.5、东西宽 3.15、高 2.17 米。北壁西北上角距顶 0.3 米处有一较大凹窝,高 1.8、宽 0.9、进深 0.35 米,波及北壁大部及西壁,使北壁底部边缘剥落有三分之二。室内另有一过道通往北后侧室,位于墓室东壁南端,其上口宽 0.9、下口宽 1.15、高 1.75、北壁进深 0.36、南壁进深 0.94 米;过道周围后期开凿痕迹明显,改变了附近顶、壁原状。门道东壁外口上部剥落(前文所述裂隙所致),凿有上下两层壁龛,上角转折处呈弧形,其中上层与门道顶齐平,距门道东壁北端 0.16 米处开凿,高 0.51、进深 0.2 米,隔梁厚 0.18 米;下层距门道东壁北端 0.22 米处开凿,高 0.48、进深 0.12 米,距地面 0.63 米。

南前侧室与北前侧室形制差别不大,南北长 4.7、东西宽 3.3、高 2.2 米。门道偏于墓室北壁东侧,受墓顶东北、西南走向裂隙影响,门道残毁严重,东壁不存,其宽度不明,高 1.8、进深 0.95 米。墓室北壁中段与墓顶空缺,其西面有一缺处呈长方形龛状(高 0.41、宽 0.3、深 0.18 米),也是受到上文提及裂隙干扰,北壁东段墙体大部缺失。南壁东端距底 0.66 米处有一凹窝,高 0.76、宽 0.3、进深 0.07 米。东壁北端亦有一过道,其上口宽 0.95、下口宽 1、高 1.93、北壁进深 0.55、南壁进深 0.4~0.6 米;大致情况与北前侧室过道相同。东壁距南壁 2.16 米、西壁距南壁 2.44 米处各有两小方孔(均宽 6、高 7、进深 4 厘米),上下纵列。东壁上孔距顶 0.48 米,距下孔 1.04 米,上孔右边同下孔左边齐;西壁上孔距顶 0.5 米,距下孔 0.96 米,上孔左边同下孔右边齐。距门道西壁南端 0.15 米处亦凿有 3 层壁龛,与甬道南壁壁龛相接,尺寸、形制大致相同。



图七//甬道壁摩崖石刻分布图

38. “宋政和四年”题刻 39. “金大安元年”题刻 40. 被打破，仅存“石口赵友山” 41. “宋大观三年”题刻 42a. “金大定八年”题刻 42b. “□□□□□□岁壬月登临此山巅到此一游”题刻 43. “金大安二年”题刻

#### (六) 甬道后段

残长 3.53、宽 2.2、高 2 米，起于北前侧室门道东壁，至北后侧室南壁西段东端，而其实际长度应止于后侧室同后室间的狭长区域前。平顶，与南北壁面结合处基本垂直。后期改动较大，甬道南北两壁均破坏严重，仅残存石柱，即以往研究所谓的“南、北中柱”<sup>[7]</sup>。

北壁（“北中柱”）开凿成 3 层壁龛，分为上、中、下三层（彩插二：1），隔梁厚 0.12 米，进深均 0.2 米左右。上层与甬道顶齐平，距“北中柱”东端 0.18 米处开凿，高 0.4 米；中层距柱 0.18 米处开凿，高 0.42 米；下层距柱 0.25 米处开凿，高 0.42 米，距地面 0.44 米，横向以 0.14 米宽竖隔梁分成三格，从西向东宽度分别为 1.93、0.35、0.67 米。

甬道后段南壁仅剩一石柱（“南中柱”），中段横截面近七棱形，底小顶大，底面近三角形，北边长 1.1、西南边长 1.4、东南边长 1.2 米。其外（北）侧面东部有明显开凿痕迹，顶、壁结合处遗留有向内（东）延伸的甬道角线残痕（彩插三：3）。石柱西北方向的三个棱面上有石刻 4 方。其西南诸棱面长期遭雨水浸淫，有石钟乳化现象。

### （七）后侧室

两室遭破坏严重，墓壁缺失，墓室敞露。北后侧室极不规整，墓壁多弧形，平面近长椭圆形，穹隆顶（开凿未完成、边缘痕迹不明显，非有意为之），东南部分缺失。门道偏于墓室南壁东侧，“北中柱”东端的北壁即为门道的西壁，东壁不存，其宽度不明，高1.8、进深0.96米。室内东西最长处3.9、南北最宽处2.45、最高处1.85米。南壁西段依托“北中柱”构成，东段敞露缺失，南壁东段与室顶衔接处有后期改动痕迹，且底部略凸于地面；东壁北段呈弧形，其南段情况同南壁东段。西壁东段有过道通北前侧室。该室有两道石灰岩裂隙，呈东北、西南走向，东北高西南低，贯穿于南北两壁及顶面，其中一道在甬道后段北壁下端开口出露，当地人称“洞泉”，雨季有水下流。

南后侧室平面近长方形，平顶，整个北壁与东壁北段缺失，完全开敞，情况同北后侧室。东西长4.1、南北最宽处3.3（以“南中柱”北壁作参照）、高1.97米。西壁北段有过道通南前侧室。东南角有一龕状凹窝，高1.58、宽1.1、进深0.32米。

### （八）后室

后室平面呈不规则梯形，顶、壁都遭后期大规模开凿，几乎完全改变了墓室原貌。南北最长处6.2、东西最宽处6.16、高2.79~2.91米，面积44平方米。东、南、北三壁偏下各有一龕状凹窝：东壁凹窝位于后室东壁正中处，底端距墓室底0.2米，高1.8、宽1.2、进深0.7米；南壁凹窝在后室东北角，底端距墓室底0.46米，高1.9、宽0.85、进深0.18米；北壁凹窝在后室西南角，底端距墓室底0.18米，高1.2、宽1、进深0.31米。南、北壁高处有小型平滑圆管状孔洞（南壁2个、北壁3个），直径4厘米左右，残深1.5~2厘米。

表一//宋金时期（含时代不明）摩崖石刻统计表



续表

位置	编号及文中插图号	尺寸(横×纵, 单位:厘米)	铭文辨识	备注
南中柱	41 (彩插三:1)	32×70	高顺中从□来游姪齐, /赵圣彰扬庄子德谒此。/□ <u>軻</u> 行。大观己丑季春上旬日志/ 登仕郎彭城县丞□□、学事郭□立石	大观己丑(宋大观三年, 1109年)
	42a (彩插三:2)	26×64	登州刺史辅国留题:/ 余自翁阳改刺文登,道至彭城,与/友人平原元□□来观此。时大定/戊子三月十二日。广平纆石列逸题。/ 石工赵友山	大定戊子(金大定八年, 1168年)
	42b (彩插三:2)	7×20	□□□□□□岁/壬月登临此山巅到此一游。	
	43	19×23	大安庚午正月/□日□□□□/□□□□高□/□□之石洞	大安庚午(金大安二年, 1210年)

此外,“北中柱”往东为一敞开区域,直接与外敞的南、北后侧室和后室相连。后侧室与后室之间似有一较窄的区域。其依稀存在的南、北壁东侧距底 1.55 米处各凿有一方孔,现高 15、宽 15、进深 4~10 厘米。此区域顶部及其周围墓壁都有扰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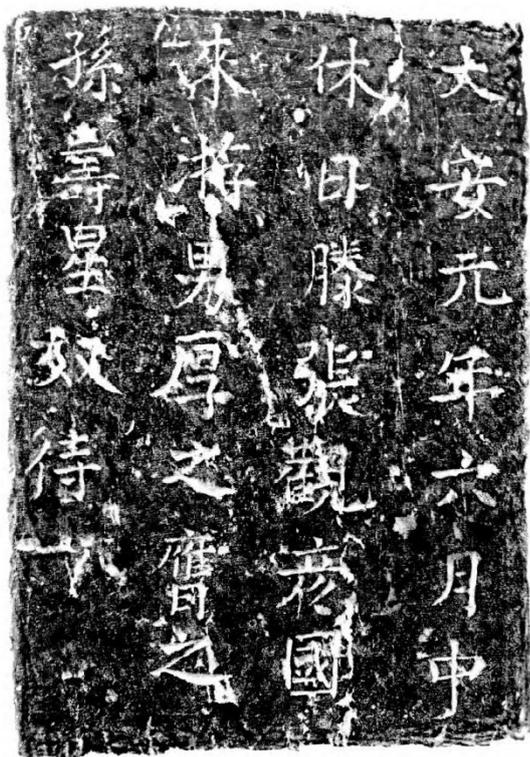


图八//15 “宋政和五年”题刻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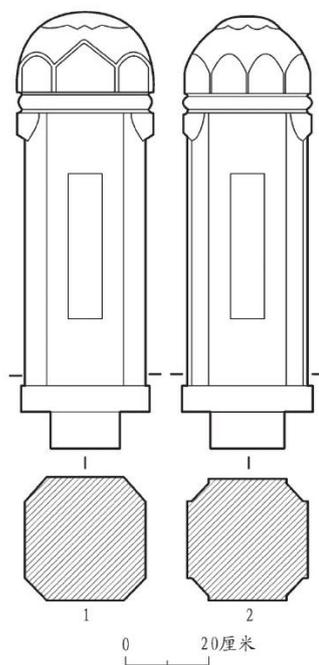
## 二、相关遗迹与遗物

相关遗迹主要包括摩崖石刻与亭台建筑两部分,另有碑刻、石望柱、栏板、佛像等遗物。

### (一) 摩崖石刻



图九//36 “金大安元年”题刻拓片



图一〇//望柱复原图

1. 第一种 2. 第二种

摩崖石刻多开凿于墓道北、南、东三立面上，共计 46 方。其中北壁有 18 方（图四），南壁有 14 方（图五），东壁有 6 方（图六）；东壁墓门上方龛后壁亦隐含有 1 方石刻。除此之外，甬道前段北壁近墓门处并列 2 方摩崖石刻，南壁近墓门处亦有 1 方，且被壁龛打破；甬道后段“南中柱”之西、北相邻的三个棱面上方分布有石刻 4 方（图七）。下文仅统计 10 方宋金时期及 7 方时代不明的摩崖情况（表一），明清石刻暂略。

## （二）石碑

石碑共五通，两通立于墓道，一通嵌于洞山小学校园院墙东北角，两通嵌于校园内第三级平台南墙基上。墓道两通石碑，一通立于墓道西端，由碑身、碑趺两部分组成。碑首呈圆形，其正面线刻大篆“勅赐永寿寺记”额头，正文及落款文字皆被磨除，经考证为明成化年间的万安所立。背面则为方瑜《游桓山记》碑。另一通早先置于墓道中部靠北壁处，上部残缺，且现被移置洞山村委会大院。经辨识，初步定名为“桓戒山更名碑”。校园院墙东北角处为《新捐贍田宣持与议重口旧田碑记》，校园第三级平台南墙基上两通分别为《重修桓山嘉福寺记》碑、《重修桓山嘉福寺碑记》碑，均立于明清两朝，此处不再详述。

## （三）亭台建筑基址

除了摩崖石刻、碑刻，桓山旧有尊祭孔子的亭台建筑。方瑜《游桓山记》：“跨洞之上，有亭翼然，曰‘生德’。由亭以陟其巅，立屋一区，以祀先师孔子，不知系谁所立。”<sup>[8]</sup>“生德”亭，现仅存南北纵列的铺地石（即券顶封口石），上有条状浅凿痕与 5 个圆形柱洞（图二，具体尺寸见上文形制与结构），西北角铺石缺，其上应亦有一圆形柱洞。山巅之上专门祭祀孔子的宅院，早已坍塌，但迟于嘉靖二十九年（1551 年）前后仍存。有关该建筑确切建造时间与建造者无从考证，但从封口石上的条状凹槽凿痕来看，与明代石料凿痕特点较为相近。

## （四）石望柱、栏板

石望柱、栏板本是洞口券顶上方亭台建筑基座的栏杆构件，属旧有遗物，现散布于墓室内。

望柱现存七截，可辨有五根，两根主体结构较完整，三截柱头，两截柱榫，与券顶平台上现存的 5 个圆形柱洞对应。根据纹饰的差异分为两种（图一〇）。第一种，整体分成上、中、下三节。上节为莲花帽形柱头，呈半球状，顶面覆盖 12 瓣莲纹，下端有 3.5 厘米高方形截面凸棱，其上取对应柱面中线各雕一个双线勾连的仓状图案，两边各雕 1 片双线勾连连瓣；中节柱身抹角，各抹角上端均垂附一向下的莲瓣，中节底端以一道高 6 厘米的方形截面凸棱收底；下节为圆柱形榫头，以保证稳立于台基。通高 103、最大径 31 厘米（图一〇：1）。第二种，形制基本同第一种，仅柱头纹饰略有差异。顶面覆盖的 12 瓣莲纹纹样略异且略凸于柱头，不见仓状图案，仅存同大莲瓣纹，柱头四面各有两瓣，对应抹角处各有一瓣（图一〇：2）。

栏板呈长方板状，均残，具体数量不明，由券顶平台上条状凹槽推测栏板至少有 4 块，长 105、宽 66、厚 12 厘米，其短边居中处各有一榫，长 12、宽 4.5、厚 5.5 厘米，正反两面都有浅浮雕图案。距边缘四周双线阴刻出长方形图框后，于框里以浅浮雕技法雕刻祥瑞、花木、人物等（均漫漶不清）。望柱与栏板之间靠预留的条状凹槽、榫头连接，安装套合后构成整套台座栏杆。

## （五）佛像

后室中间偏后位置立有一尊佛像（图一一），圆雕。肩部以上缺失，残高 58~67、宽 40~58、厚 20~35 厘米。上身似内着僧祇支（或偏衫）、外披两层袈裟，下身着裳，背面不见纹饰。左臂下垂，覆掌前伸扶膝，右臂上举，弯折贴胸，右手掌残，所结法印不明，似半跏趺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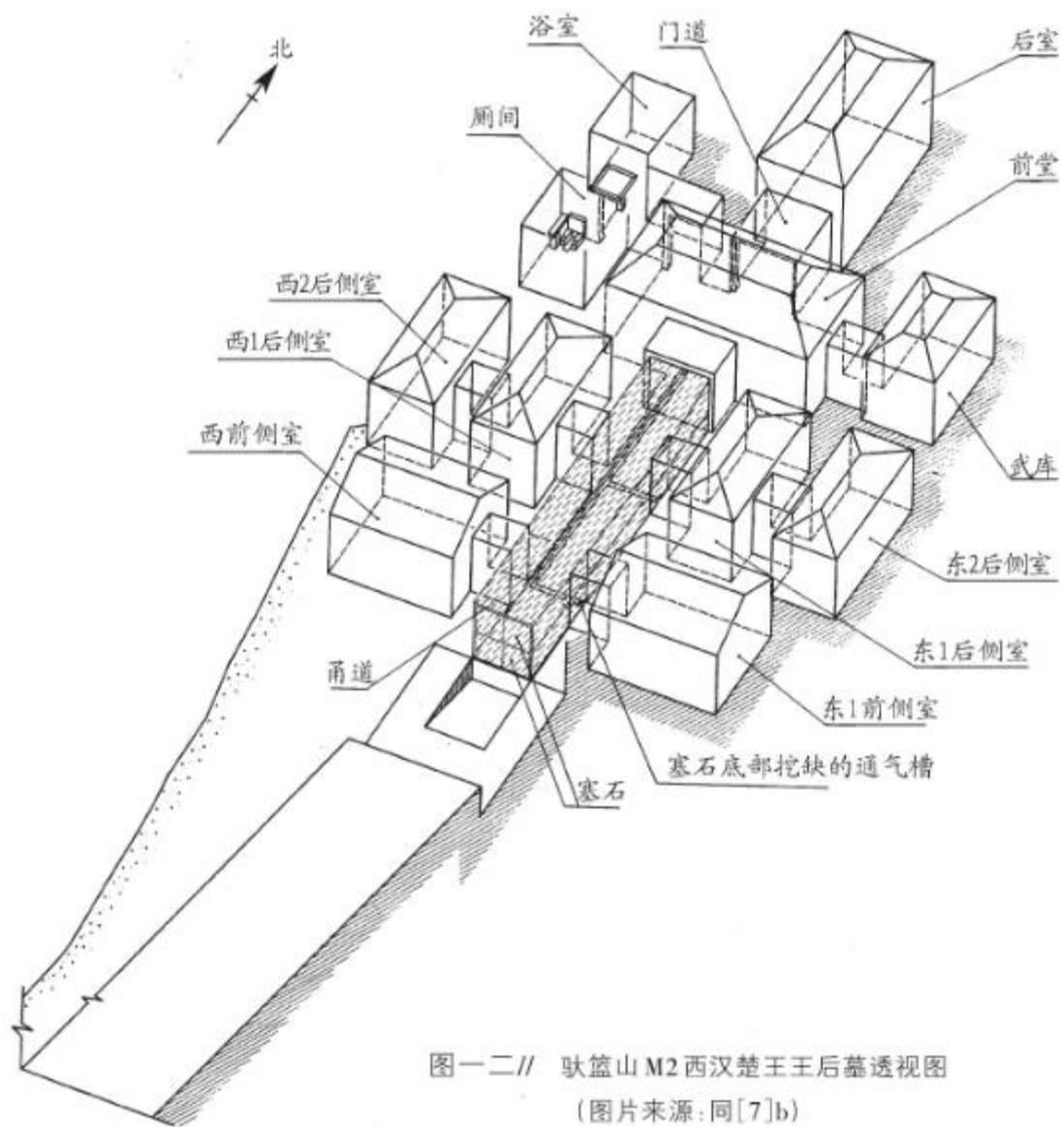
## 三、结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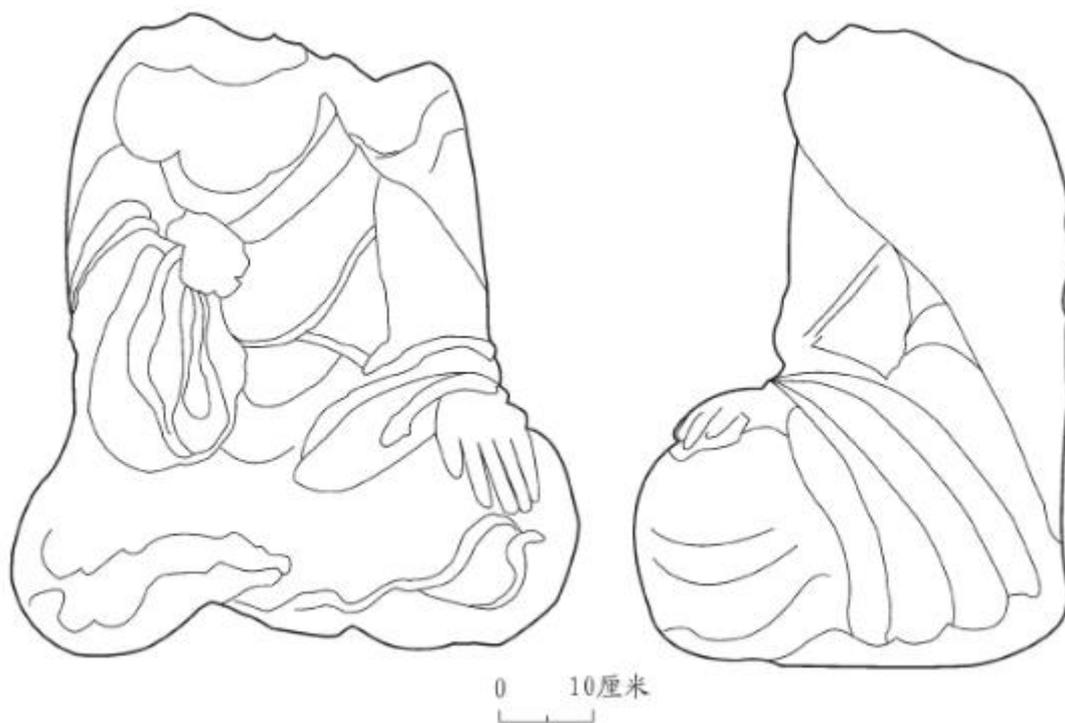
该墓冠以“桓魋石室”的名称流传已有千余年，直至 1986 年随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发掘过程中对该墓的调查，而对其年代有了不同认识，认为（“桓魋石室”）“是西汉时期一座诸侯王、后级别的大型墓葬，可能和北洞山汉墓有某种联系”<sup>[9]</sup>。该墓建筑体量较大，经测算开凿的石方量超过 560 立方米，从建筑结构上看，此墓墓道较长且宽（宽 4.65 米，江苏徐州驮篮山西汉楚王墓 M1 宽 4.6、M2 宽 4.68 米<sup>[10]</sup>）；分为前后两段，前为斜坡后为平底，且两段之间存有高差；平底墓道近墓门处开凿一长方形凹坑。这三方面与驮篮山西汉楚王墓 M1、M2 极为相似（图一二），三墓近乎相同。墓道东、北、南三壁及墓道上方的方形孔洞也非孤例，狮子山、驮篮山西汉楚王墓中均见。

受局部岩质松软易碎、裂隙雨水浸蚀等自然因素影响和后世借用、改造、破坏之扰动，墓室顶、壁出现了诸多自然脱落以及后期人为挖除、增凿及钟乳石化现象，大大改变了该墓原貌。但代表汉代工艺特色的粗深凿痕<sup>[11]</sup>却不易被完全掩盖，与其他西汉楚王岩洞墓凿痕特征接近。这种造墓方式的出现最早始于西汉初年，肇始者是高祖刘邦异母弟刘交<sup>[12]</sup>，远晚于司马桓魋的春秋时代。从墓葬形制方面考虑，该墓是一处“凿山为藏”的大型横穴式岩洞墓，因此笔者初步推测其可能是“北洞山汉墓之王后墓”，这与过去梁勇先生考证“北洞山汉墓的墓主应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所谓‘桓魋石室’乃是其王后墓”<sup>[13]</sup>相一致。

“桓魋石室”虽遭自然侵蚀、人为因素破坏较为严重，但其墓道、墓室平面基本保存完好，墓葬结构相对清晰，且保留了宋金以降大量摩崖石刻、亭台建筑基址等遗迹，为进一步研究西汉大型岩洞墓提供了新的资料，同时亦为研究岩洞墓后代改造再利用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



图一二// 驮篮山 M2 西汉楚王王后墓透视图  
 (图片来源:同[7]b)



图一一//佛像正视、侧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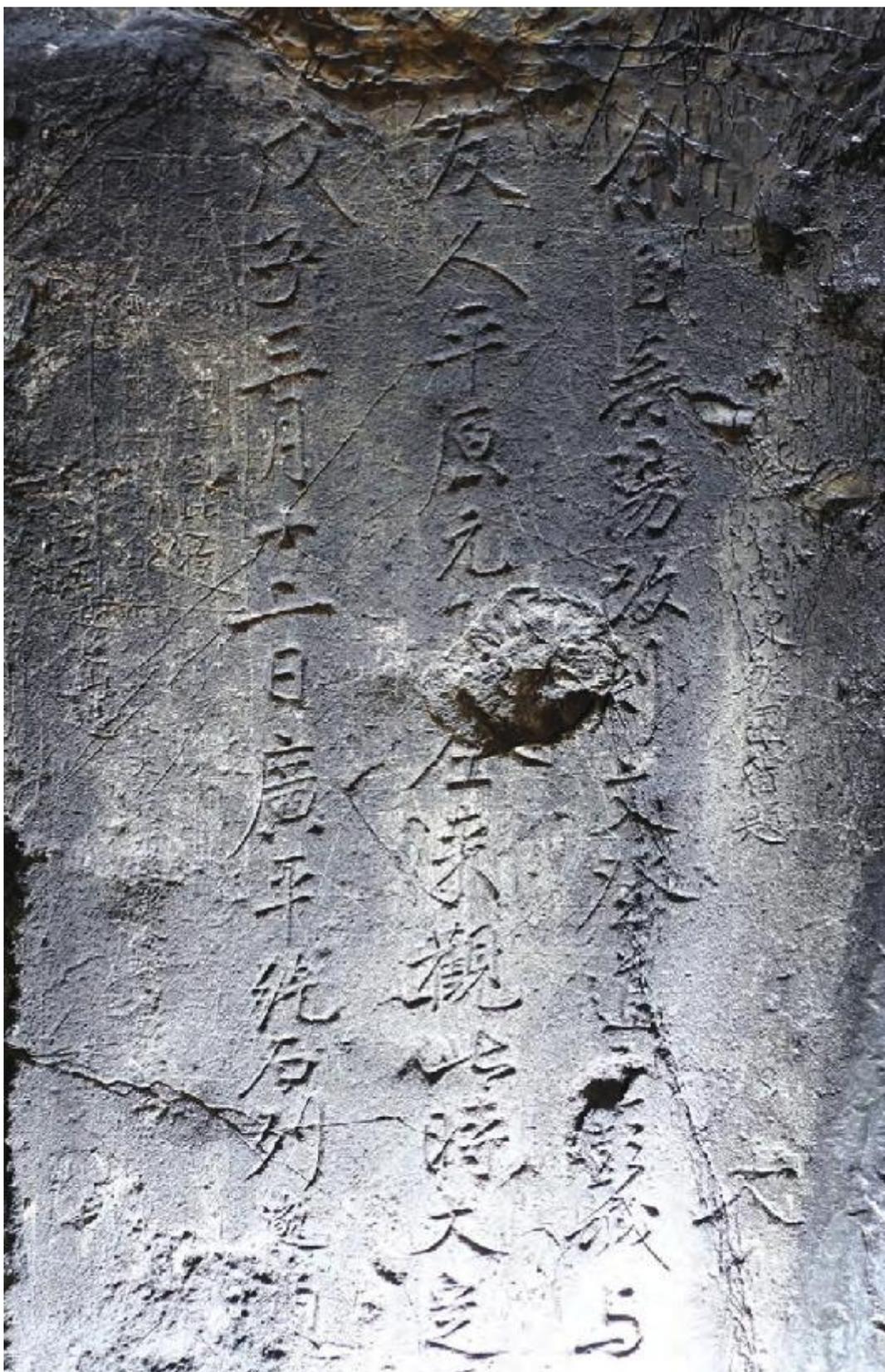
1. 甬道后段北壁壁龛



2. “金大安元年”题刻



3. “宋政和四年”题刻



2. “金大定八年”题刻



3. 南中柱上端残留甬道角线及后代开挖断痕



1. 券顶外口及券下仰视



3. “宋元符二年”题刻



2. “宋宣和三年”题刻



4. “石洞何年此凿成”题刻

#### 参考文献

[1] 北魏·酈道元著、陈桥驿校释：《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 2007 年，第 601 页。

[2] 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第 1、2 页。

[3] 宋朝称圣女山、桓山，明时起称桓山、魁山、洞山、桓戒山等。

[4] 指 1958-1961 年利用老不牢河（原荆山口河）河道取直而成的大运河新河段，非元至明中叶的古泗水河道。其与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辗转迁至微山湖东的洙河运河（今韩庄运河-中运河）分流并列，于济宁南阳镇分，在邳州大王庙合。桓山附近的此段运河的前身为荆山口河茅村河段南支。

[5] 同[2]。

[6] 梁勇：《西汉楚王与楚王墓》，河海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第 163-165 页。

[7] a. 梁勇：《桓魁与桓山汉墓》，《徐州日报》1994 年 1 月 15 日第 3 版；b. 梁勇：《从西汉楚王墓的建筑结构看楚王墓的排列顺序》，《考古》2001 年第 10 期。

[8] 石碑铭文辨识如下：《游桓山记》桓山在泗水之上，余至徐之明年秋八月四日，始得游焉。山之椒有佛宫，宫之后则石洞，盖宋司马桓魁之墓，所谓石椁，三年而不成者是也。跨洞之上，有亭翼然，曰“生德”。由亭以陟其巅，立屋一区，以祀先师孔子，不知系谁所立。其意虽善，而其事涉于争圣人之意，恐不如是也。魁欲害孔子，当是时，非有势利之加，要亦不过争名而已。至其经营石椁，无亦为千万年不朽之计，顾乃遂非长傲，自罹于凶暴之归，使兹荒丘残陇，遂为后人慨叹指斥之地。苏子以为愚人，而或者因之，又目以为愚穴，不魁之名，历千万年而不可易。使其迁善改过，以孔子为依归，则虽有棺无椁如颜氏者，

---

亦将与孔林邹峰分秀竞美，瞻望肃拜之不暇矣，宁有訾议者耶？噫，魁则已矣！后之人善不能迁，过不能改，怙势嗜利而卒不免于罪戾者，皆此类也。其为愚，孰甚焉？于此而不知戒，是谓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历览之馀，寄兹一慨，返而识之舟中。嘉靖庚戌（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春桃月朔旦，暉山方瑜书。

[9] 同[2]。

[10] 邱永生、徐旭：《徐州市驮篮山西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173、174页。

[11] 刘照建、邱永生、张玉：《徐州楚王陵开凿技术综合研究》，《江苏文博科研课题成果汇编（2002）》，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5-234页。

[12] 刘瑞、刘涛：《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98页。

[13] 同[6]；关于北洞山楚王墓二代说，学界近年已达成共识，持此观点者还有葛明宇、刘照建等先生。详见 a. 葛明宇：《徐州北洞山汉墓年代与墓主探讨》，《考古》2009年第9期； b. 刘照建：《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墓主再考》，《华夏考古》2015年第4期。